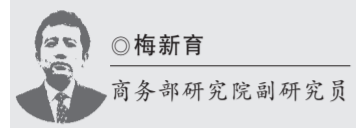


Column

■ 独辟蹊径

岂能为一时之快罔顾长久

——消费券不该是我们的选项



◎梅新育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消费券陡然走红，从“欧元之父”蒙代尔到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教授蔡恒进等十位学者，不少人视之为提振消费的有效反危机对策而极力倡导，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付诸实施。

可是，消费券果真是个好主意吗？我看未必！

不错，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余年来我国高度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内在要求最大限度地压低本国国民的收入，这一点恰恰与经济发展本来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只有依靠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才内在要求提高本国国民收入，以便为生产创造更多的有效需求，才符合我们经济发展的本来目标。

可究竟如何才能可持续地提振消费？现在各方已经取得共识的是，首先得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国民对就业的预期。在这里，投资与消费并不完全矛盾，因为投资创造就业机会，有了就业机会才能消费；而且农村地区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完成，农民的产品才能因面向更广大市场而获得更多的收入，进而扩大消费。

其次，改善对既有可支配收入的预期。一方面要重建和完善养老、医疗和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改变消费者预期；另一方面需要适度扩大保障性住房需求，在维持、提高房地产交易量的同时抑制房价，从而释放出更多购买力。同时，在国际初级产品市场普遍暴跌的背景下，我们还需要通过维持和提高政府收购价、建立和补充重要大宗物资储备等方式来支持某些重要初级产品的价格和，防止价格破坏，而这类价格支持措施主要应当应用于农产品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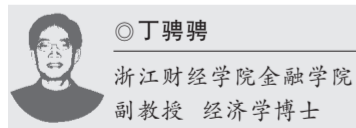
第三，改善收入分配失衡，让国民收入中有更多的份额流向中低收入阶层，进而转化为国货生产和销售者的收入，而不是高度集中于一小撮高收入阶层，进而去支持海外奢侈品生产者和销售者。

在有所这些可持续提振消费的措施当中，消费券不在其列。消费券本身并非当务之急，而且，不管是如同我国台湾地区那样无差别地普遍发放消费券，还是如同十位学者所建议的那样向低收入家庭每人发放1000元，都不太可能实现有效提振消费的期望目标，反而有叠床架屋之嫌，并有可能产生深远的负面后果：

■ 斜阳芳草

鱼与熊掌必须兼得

——中国如何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下的经济增长



◎丁聘聘

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未来中国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是保证国际收支平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没有国际收支平衡，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如果中国在未来的几年内仍然外部严重失衡，那么内部均衡也将受到严重威胁，最终要证明无通胀下的充分就业，以及高速的经济增长都将是困难的。

看来，我们需要更换一下思路。按照西方货币理论，经济政策一般都有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的目标，但这四个目标的重要性不一样，而且提出的时间也有着先后之别。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还处于金本位制下，各国信奉“自由放任”

收入分配失衡的确是导致我国消费率过低的重要因素，财政作为再分配工具有责任为扭转收入分配失衡发挥作用，但扭转收入分配失衡的核心应当是改善收入分配规则使之更加公平，而不是向大众滥施无偿获得收入的机会。我们应做的是认清现实，而不是制造梦幻；有责任心的地方官员们应做的是艰苦奋斗去寻求长久之计，而不是一味追求做起来最轻松、最能迅速吸引“眼球”的所谓“政绩”。

我们当前面临的输入型经济危机与地震、火山爆发、洪灾等自然灾害不同，那些灾害下的难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已被打乱，若不立刻给予无偿救济就有饥饿丧生之虞；而受经济危机冲击者仍然生活在正常秩序之中，完全可以期待通过投资、减税等其他反危机措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他们创造更有尊严的自食其力机会，而不是依靠近乎救济的消费券来剥夺他们的尊严和自立精神。

即使需要救济低收入群体，也无需依靠消费券。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低保、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制度用以帮助低收入、下岗群体度过困难，假如这些社会保障措施覆盖面和力度不足，完全可以通过适度扩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更好地实现预期目的，何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另起炉灶？何况那样除了加大行政成本之外，还会额外制造许多内耗，降低行政效率。

从各个城市的实践来看，有的消费券属于购物券，限在指定商场消费；有的属于购买服务，如南京计划派发的2000万元乡村旅游消费券。指定哪些商场和旅游点纳入消费券消费定点单位，其中寻租空间可观。对这种消费券选择和发放过程中产生新的腐败机会，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千万别在“扩大内需”幌子下堂而皇之地为腐败者烹饪掠夺侵吞的盛宴，事后又嗟叹莫及。

我们期望的是可持续地提振消费，而消费券即使有效果，也仅仅是一次性的。而且，即使有一次性的提振消费效果也不可高估，因为消费券可能与消费者计划中的其它支出相互替代，从而限制、抵消其增加消费的作用。

目前，在铺天盖地的“扩大内需”声浪中，我国消费券实践似有失控之虞，从日常消费品到旅游、住房、教育，消费券覆盖的商品和服务种类越来越多，发行规模越来越大，有报道称某些地方政府计划将公务员部分工资折为消费券发放，有的消费券甚至跨地区发行……消费券正越来越像一种变相

货币，而货币发行是中央银行依法独占的权力，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机构对这一权力的侵蚀都是在扰乱一国经济基本秩序，难道我们要为了一时一地的短暂兴奋而牺牲法律和基本经济秩序？

更令人必须警惕的是，盲目追捧消费券这种无偿获得的福利，将损害国民自我奋斗的精神，而自我奋斗的精神恰是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而不坠、经大难而能重生的关键。是的，改革30年来，我国已经让世界最平等国家之一发展成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收入分配失衡也是导致我国消费率过低的重要因素，财政作为再分配工具有责任为扭转收入分配失衡发挥作用，但扭转收入分配失衡的核心应当是改善收入分配规则使之更加公平，而不是向大众滥施无偿获得收入的机会。社会主义分配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而不是别的，除无劳动能力者外，福利必须与工作挂钩。我们应做的是认清现实，而不是制造梦幻；有责任心的地方官员们应做的是艰苦奋斗去寻求长久之计，而不是一味追求做起来最轻松、最能迅速吸引“眼球”的所谓“政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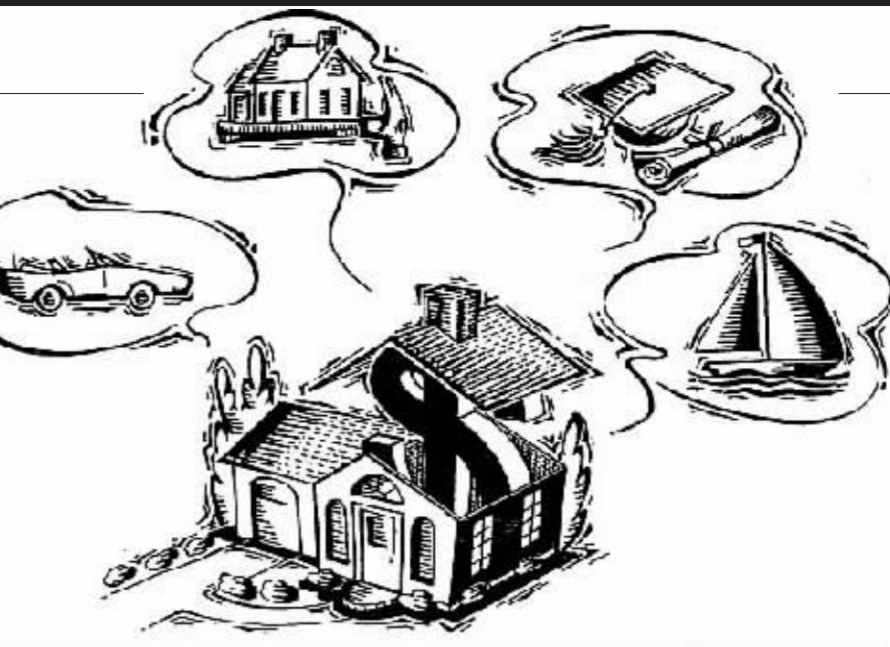
二战之后联邦德国经济复兴总设计师路德维希·艾哈德有言：如果社会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得到全部保障，绝对没有任何生活风险，那么我们就不能希望他们的精力、才干、创业精神和其他优秀的品德得到充分发挥，而这些品德对民族的生存和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国此前改革过程中无疑地全面废除社会保障体系确实是代价高昂的大错误，近年的纠正固然必要，但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等不靠、不要”的自强不息精神，曾激励了几代国人，可是这些年我们屡见不鲜的却是对这种可贵精神的嘲弄和诋毁，是不少地区不择手段游说上级政府将本地区纳入贫困地区行列而享受各种补贴、资助……难道这样的堕落迹象还不足以让我们警醒，反而还要去推波助澜吗？

进口增长就很快，导致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而要消除国际收支逆差，则需要压缩国内需求，财政货币政策一旦紧缩，又会引致经济的衰退，导致失业增加。

在这四大经济政策的目标中，国际收支平衡往往被放在最后一个位置，甚至常常被忽视。在国际收支平衡与其他目标发生冲突时，政府往往以牺牲“国际收支平衡”项目目标以求得其他目标的实现。但随着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深入，如果一国的外部均衡难以实现，反过来又影响内部均衡的目标。我国最近的经济状况正是如此。这几年，我国一直保持巨额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这就形成“流动性过剩”，导致“内遇通胀、外遇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经济增长也受到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国际收支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保持了“双顺差”。但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高速增长”的组合是不可持续的。不光不可持续，而且在目前这个环境下已经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在2006年底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



■ 知无不言

所谓主流非主流 从来只是相对的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独立于人身之外的自然现象，并不受人类各种陈述的影响，因而人们可以将其当作纯粹的客观，置于自己的观察、分析研究之中。但社会现象则无论如何都不行，因为，研究者本身就是社会的一分子，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难以分离。

所以，就社会科学理论或思潮而言，主流者，未必是真理。但只要成为主流，就会成产生难以想像的力量，而不管这种力量的后果是否是灾难性的。无怪乎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舒尔茨教授总结说：“主流社会思潮塑造着社会的制度化秩序……并且，业已建立的制度的失灵反过来会改变社会思潮。”

而那位号称“哲学天才”的维特根斯坦则一语道破：人类生活的实质，其实是一种语言活动。萨特则直接将其一本童年自传体著作取名为《词语》。凯恩斯在他那本传世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束语中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思想者，无非是一些有着严密逻辑体系并学术化了的说法而已。尽管思想可以成事也可以败事，但没有思想，断不会成大事，或者持续成事。仅从这一点上说，我非常欣赏余秋雨对晋商成功的分析。这位没有专门学习过经济学的文化学者，对促成历史上晋商成功的四大人格素质的总结并不亚于优秀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分析：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特别是，在分析晋商最终趋于败落的内在原因时，他的结论更是突出了思想的重要性：

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精密的哲学思维、精微的学术头脑似乎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钱财的发言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没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们也就无法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即便在商务上再成功也难以抵达人生的大吉祥。”

也正因此如此，我非常赞同经济学家林毅夫在2007年走上国际经济学界顶级讲

坛马歇尔讲座时，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发展与转型成功的原因概括为“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其中的根本因素是思潮”。

二战之后，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占主流的社会思潮，要想加快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应当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实际上，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才是这些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物质资本均是劣势。但这一主流思潮却极大地左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流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执政方针。因而现实中，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不仅没能增加经济体的剩余，促成技术和产业升级，反而建起了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甚至经济和社会濒临崩溃。韩国、中国台湾与中国香港等经济体，由于逃脱了这一主流思潮的影响，从其比较优势出发，优先发展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对外开放弥补本土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之需，待经济剩余积累到力量和条件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时，才集中资源对资本品进行“进口替代”，从而造就了大量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技术和产业选择不断升级，到八九十年代时大大缩小了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资本主义胜利论”成了国际主流社会思潮，集中体现为激进推进市场制度建立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主张转型应是一种短时间内“宏观先行”的“休克疗法”。但受这一主流思潮左右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却遭遇了长时间深度衰退。现在看来并不成功，诚如林毅夫所言：“只有休克，没有疗法”。倒是中国和越南，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非主流转型路径，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引进外资，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技术和产业升级，从而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

可见，无论从大处看，还是从小处讲，在社会事务中，人们的说法都不可忽视。一个人或者小群体，应努力寻求逻辑严密而成体系的说法，对于零星而散乱的说法，一则慎言，二则慎听慎信。一个国家，应允许多种说法充分碰撞而辩论，特别是应当尊重那些个体和基层的创新及由此演化而成的说法。对于非主流的说法或思潮，不宜过早下结论。对思潮的识别和遵循，不应以主流与否为原则，而应看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是否符合比较优势，是否会带来积极的社会效果。唯有如此，才不断有“思想的解放”和新思想的形成。

尽管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需要在保持国际收支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但国内外情况复杂，从最近两年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在保证内外均衡的目标上，并没有收到应有效果。从理论上讲，既要实现国际收支均衡，又要保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本来就十分困难。而在许多有影响的理论中，包括哈罗德(1939)和索罗(1956)模型，以及众多的“新增长理论”则都是一个封闭经济的模型，在他们那里，从来就没有将国际收支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来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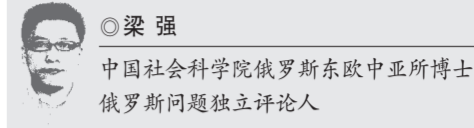
1979年，英国肯特大学的Thirlwall提出了“国际收支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理论”，他本来用“国际收支约束”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但他的这一理论框架也给了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思路。Thirlwall认为，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率等于出口增长率与进口产品的收入弹性之比，即 $g = x/\pi$ ，其中 x 表示该国的出口增长率， π 表示进口的收入需求弹性，这就是“Thirlwall定理”。按照这个理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低增长率是因为出口增长率低、进口需求弹性太大造成的，所以形成“低增长+国

际收支逆差”的格局。而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却是由于出口增长率太高、而非进口产品的收入弹性太小造成的，所以呈现经济高速增长与双顺差相伴的局面。

在Thirlwall等经济学家看来，一国的经济结构不同，进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各不相同，由此造成国际收支的不同表现，所以一国的国际收支问题本质上是经济结构问题，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就会表现为外部失衡。按照他们的理论，一国要实现国际收支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并非不可能，只有改变生产结构和产品性质，由此增加出口增长率，并减少进口收入弹性，这就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如果依据传统的国际收支平衡手段，如支出增减政策、支出转换政策(汇率贬值)，却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国际收支失衡。

具体运用到双顺差的中国，如果我们能保证国际收支均衡条件下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升产业结构与调整经济结构，而所有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应该围绕着这一点来展开，而不是单纯地扩大出口(及投资)。

油价跌破了 俄罗斯人的忍耐力



◎梁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博士 俄罗斯问题独立评论人

“肥年过去了”。这是很多俄罗斯人现在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经过了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去年俄国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变得糟糕起来，股市崩盘，银行破产，卢布快速贬值，失业率大幅增长，工厂开始关门歇业，俄罗斯人重新开始在家里储备美元。与此同时，沉寂多年的全国性示威又出现了，30多个城市同时爆发了游行和抗议活动，矛头直指普京。

每当国际油价暴涨暴跌时，俄罗斯就会出现难以避免的经济危机。苏联时期如此，现在也同样难以幸免。这当然与其传统的能源导向型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但还有个更重要的制度性因素，那就是克里姆林宫习惯了威权式治理模式。

《金融时报》说，正如经济繁荣会使一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成倍增长一样，经济衰退也会放大其体制弱点。这场新的经济危机就快速暴露了普京宏伟计划中的设计缺陷：未能建立公正的国家制度，取消了宪法中的制衡机制，依靠一种具有潜在风险、依赖于克里姆林宫提供经济好处的社会契约等。同时，也使得普京一直以来所依赖的中央垂直治理的种种弊端迅速暴露出来。由于没有选举和监督压力，政府官员们一方面继续他们在苏联时期的官僚主义，对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和经济诉求不闻不问；另一方面在处理问题时又谨小慎微，反应迟钝，哪怕是极细小的问题也要等到莫斯科做出反应之后才能做出决定。比如这次远东地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二手车征收进口关税政策，决定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本国汽车工业，但在钢铁业寡头们的操纵下，却成了向普通消费者转嫁危机的手段。当地消费者很早就对此怨声载道，但地方官员们只知道唯上是从，最终使矛盾激化。就连梅德韦杰夫的经济顾问阿瓦菲在抗议活动发生后也指出，在普京的治理体系下“人民和政权之间没有可以通过议会，非商业性的组织和机构进行双向的联系，现在这种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电视宣传进行的虚假联系，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种联系将难以再继续生效”。

尽管普京本人的政治威信还没有受到经济危机和抗议互动的影响，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相信正是普京将他们从90年代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危机当中拯救了出来，所以尽管面临经济危机，普京今天在俄罗斯的支持率仍然非常高。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普京在应对这场危机时采取的一些举措，并不利于这场危机的妥善解决。

首先，面对这场重大的经济危机及其带来的政治冲击，普京并没有采取任何手段缓解危机，而是习惯性的首先巩固权力。比如“刑法叛国罪法”，发动统一俄罗斯党打压反对派等。莫斯科卡内基金会主任特列宁说，普京建立的威权治理之所以能够维持，其最主要的因素是获得了被统治者的同意，但现在这种同意有可能消失。在普京的八年任期内，俄罗斯人总是这样说，好吧，就让国家把一切都管起来吧，只要我们有新的汽车，超市里商品充足，市场上卢布坚挺，每年总有去海边度假一次廉价休假的机会就行。但是在油价暴跌至每桶40美元而不再是140美元时，克里姆林宫很难找到新的途径继续向普通人提供由政府而不是市场带给他们的经济红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普京式的威权治理正在渐渐失去它最大的合法性支持。俄罗斯的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在预测，随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在2009年的进一步放缓，国内的抗议活动将变得更多，社会也将变得更加动荡。

其次，由于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理负责国内事务，因而在俄罗斯每当出现社会和经济问题时，总理总是首当其冲。1998年金融危机时，叶利钦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治声望，曾连续撤换数名总理。作为普京亲手提拔的接班人，梅德韦杰夫当然不可能撤换普京。但鉴于俄罗斯的这种政治传统，如果国内经济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和改善，普京很可能不会再留在总理这个火山口位置上，而会采取新的步骤。莫斯科政治圈里现在已有这样的传闻，普京正准备将他重返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提速”，其具体实施很有可能就是在今年。去年12月俄罗斯杜马同意修宪，将总统任期从4年延长至6年就是一个征兆。如果该计划顺利实施的话，普京将能够名正言顺地一直担任俄罗斯最高元首直到2015年。

美国风险评估公司欧亚集团最新的报告也认为，作为俄罗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普京显然不是愿意冒险的人。他决不会允许他亲手创建的这一体系在梅德韦杰夫手里垮掉。因此，随着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可能会促使他在政治上更加趋于保守。这种保守不但对应对这场经济危机不利，对于俄罗斯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一历史性的制度转轨也非常不利，很可能迟滞、甚至扭转俄罗斯制转轨的进程。

第三，当国内政治保守主义加剧时，很难想像俄国的对外政策会变得更加开放。稍早时候俄罗斯中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证明，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莫斯科仍然将政治利益摆在最高位置。在年初参加达沃斯论坛时，普京提到经济危机的“罪人”时，也首次将中国和美国放到了一起。普京说，正是这两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现状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一个中心实际上无限制地和不受监督地印刷钞票和消耗财富，另一个中心则生产廉价商品和继续让其他国家花钱。这番言论表明，莫斯科仍然没有认识到俄罗斯的命运也与世界经济紧密相关，要更全面地参与其中，而是仍固执地相信，摆脱全球性经济危机是每个国家自己的事。

2009年的俄罗斯会有什么惊人动作，实在很难预测。